

第一章 绪 论

如今的世界是一个千姿百态的世界，假如一个人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年代一直沉睡到现在醒来，他一定非常奇怪，身边的这些日用品是哪里来的呢？怎么没有一件是自家做出来的，而且也几乎没有一件是邻居们做出来的，他一定怀疑自己来到了“世外仙境”。

社会的发展确实难以让人预料，十八世纪末英国有位名叫马尔萨斯的牧师提出一种理论，可用这样一则龟兔赛跑的童话故事来描述：乌龟和兔子赛跑，乌龟拼其全力，也赶不上兔子速度的百分之一。当兔子跑到终点的时候，乌龟还在离起跑线不远的地方一步一步的爬行。马尔萨斯认为，生活资料的增长和人口的增长之间，是这种龟兔赛跑的关系。社会财富按算术级数增长，人口按几何级数增长，财富的增长赶不上人口的增长，所以人口的增长必须有一个限度，要与物质资料的增长相适应，不然，人类的前景堪忧。

上个世纪的七十年代，西方学术团体罗马俱乐部，也曾提出“增长的极限”理论，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表现出悲观的看法。不管是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还是罗马俱乐部的悲观思潮，也许都有一定道理。然而，我们放眼看看今天的世界，比起马氏时代，人口数量增加了许多倍，人类的生活水平却大大地提升。平均寿命，比二百多年前提高了约三十岁。今天一般人家的物质生活条

件，许多东西是几百年前的皇家贵族也无法得到，更不用提几千年前可能还是住在茅舍或住山洞的三皇五帝。近百年来炎黄子孙虽然多灾多难，但目前经过二十余年的制度改革，国家的发展尤其是沿海开放地区的变化确实令人惊叹。

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社会财富迅猛增长，又是什么原因使得经济停滞不前甚至倒退？跳出了条条框框的经济学家们已经看到了问题的所在：分工、交换、市场、竞争，由之而来的专业生产，与之相适应的各种各样的经济制度，——就在这些经济学范畴和原理之中，深深地隐藏着我们要寻找的答案。

我们身边的一切：电视、电脑、家具、衣物、日用品……，哪一样都不是由自己造出来的，而是在市场上交换得来。人们为什么不自己造而要到市场去交换呢？因为谁也没有这个能力！比如说一支普通的圆珠笔，把你放到一个荒岛上，你能造出来吗？显然不能。就是一百个天才集中起来花一辈子时间也不能。因为制造圆珠笔的技术、设备和材料是数代人在一定条件下缓慢积累的结果。今天一枝圆珠笔的价格也就相当于一个普通劳动力几分钟的劳动所得。为什么一个人几分钟的劳动就可换取一百个天才一辈子也完不成的业绩呢？其中的奥妙就包含在分工、交换、市场等等经济问题的基本原理之中。

第一节 什么是经济学

人类的历史究竟是如何的发展？是直线地朝着事先决定的必然的方向发展，还是象空中漂浮的气球，任由外界气流或其他偶然的作用力推向不可知处？哲学家的思辨因此分成不同的派别。必然论者认为社会制度有着明显的单一线路的阶段性，偶然论者却往往陷入不可知论的泥潭。更多的经济学家则认为经济社会抑或象生物的进化那样，也是在特定的环境中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的产物。由于客观规律的必然性和人类社会生活的偶然性的共同作用，社会经济制度具有不同线路的多样性。关于类似生物进化的理念，正在成为经济学研究的宏观思维。人们试图站在此基点上来看待各种各样的经济问题。整个社会变迁的过程之中，分工、交换、竞争，市场的出现，企业的形成，以及更多创新的发生等等，经济社会的演化模型与生物界有许多类似之处。社会中游动着无数的人，生存着无数的家庭，更有大量的企业和社会团体，有的诞生，有的淘汰，有的不断壮大，有的逐渐衰落，与生物世界几乎同出一辙。当然，经济社会中的演化与生物的演化也有很大的差异。生物的演化依赖于基因的逐渐变化，而经济的演化则有赖于人的行为，有赖于人的感觉、观念和意志，尽管这些意识的内容都是从现实中得来。每个人和每个社会组织（比如企业）都在不断的模仿、竞争、创新，或衰败，或发展。

如何理解经济社会、科学技术和管理的变迁？如何理解经济的演化过程？在经济系统中，每个人就象是生命体中的基因，而家庭、企业和社会团体则是象细胞和肌体组织那样的生命结构，社会就是生命系统一样复杂的演化系统。从经济发展的历史来看，它具有完全的演化特征：选择、杂交和突变。所以我们可以用类似生物进化系统的理论来研究经济问题。生物通过遗传和变异，适者生存；基因是朝着有利于其生存的方向演化，具有一定的目的性。经济社会也与此类似，在企业中，经理人员的决策有其目的性，职工的创新一般也具有目的性。虽然在一个企业，大量的工人与研究人员，他们可能多数只懂得某一部分知识，只参与一项工程的某部分工作，尽管他们难以预测每一个创新会给社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但千万人的智慧的叠加和有机组合，便在社会海洋中，以“适者生存”的竞争，演化成这个经济社会的发展方向和轨迹。

学过物理学的人都知道，科学家哈雷按牛顿的力学原理从事研究，他观察了一颗慧星的一段轨道，据此计算出它将在七十二年的时间内返回，并计算出它再次出现在天空某个确定的点和确定的时刻，难以置信的精确至分钟。七十二年之后，牛顿和哈雷都去世很久了，哈雷慧星正象哈雷所预测的那样再次出现。象这样的事例在物理学等学科中不计其数，因而奠定了他们学科的基础。经济问题也许更带模糊性，但经济理论也必须有类似的案例，才能在人们的心目中留住它的光辉。当然做经济研究不等于做物理化学实验，更不等于做股票预测，研究经济并不是研究物质运动，也不是研究赚钱。经济学应该有它可发现的规律，有它可分析预测的事情。人们的决策总是依赖于对过去行为结果的记忆，从事物的连续性考虑，对过去的解释，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对未来的预测。

象其他科学一样，经济研究应该以真实世界的现象为出发点，详查其实，用某一理论反复推敲，推出可以验证的假说并对现实世界的经济现象作出解释，然后再找其他现象试行验证，试着把假说推广为一般化，希望它能广泛地伸展到其他现象，以验证它是普遍规律。美国物理学家费曼说“无论是在科学领域还是在其他领域，探索和怀疑的自由是非常重要的。它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一种追求，是人类为了获得怀疑和探索的权利、为了克服不确定性而进行的斗争”。

传统的经济学研究偏重于技术创新带来的变迁，而未能注重制度对技术创新和社会变迁形成的巨大影响。所以，近年来新兴的经济学派更加注重一件事，那就是将政府政策和制度变迁对技术变迁及其对社会经济的影响，纳入了经济学研究的主要领域。而且经济学的研究逐渐拓展到政治、社会、法律、心理学等领域，反映了经济学的社会人文趋势。一些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从

政治学、社会学、法学、心理学和信息科学等不同侧面分析经济问题，取得了可喜的成功。

什么是经济？象许多基础概念一样，要明晰的解释它并不容易。人们一般可以理解：经济指的是与社会财富有关的事。经济是一切社会资源的配置和利用；经济是人们在生产、生活中创造财富、积累财富和消费活动的总称。它与文化、政治等活动相对比而存在。

什么是经济学？有的经济学家把经济学定义为：研究如何最有效地利用稀缺的资源来满足人类的愿望。

有的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学就是研究价值形态转化的科学。

一个社会要把经济搞上去，就是要组织人力物力去生产大家最需要的商品或服务，经济学将组织人力物力这件事称为“资源配置”。所以，还有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学就是研究如何最有效地配置资源的学问。

但多数经济学家把经济学定义为：研究人们生产和消费活动的科学。几千年甚至几万年以来，人类的生存、社会的发展，离不开生产、消费活动。经济学就是要探究人类这些社会活动的一般规律。

首先让我们来初步界定一下生产和消费活动的含义。原始的、从高等动物缓慢分离出来的人类，从动物般的狩猎和采集，过渡到有意识有计划的生产活动，这当然是一个极其漫长的过程。从打猎到畜牧、从采摘到种植，出现了牧业和农业。被驯化的野生动物成了家畜，被驯化的野生植物成了农作物。牧业和农业从狩猎业和采集业中分离出来，这就是人类社会的第一次生产大分工。我想，人类文明，一定是伴随着社会大分工而诞生。因为在我的想象中，这以前人类的狩猎和采集，更多的保留着类似于动物适应生存的觅食活动，似乎还远离文明。

由于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的需求，出现了制造业。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在边远的农村还保留着古老的制造业的原始形式，他们走街串巷，一直延续了几千年。如：做衣服的有针匠（裁缝），做金属工具的有铁匠、铜匠，做首饰的有金匠、银匠，做家具的有木匠、篾匠，做房屋建筑的有石匠、泥瓦匠，等等。游动或作坊式的制造业遍布古老中国的乡村城镇。制造业对于农业和牧业来说是新兴产业，以致逐渐发展到现代机器大工业。

由于产品的剩余和人类需求的多样化，自然就出现了交换，据说在远古社会有一个叫做“商”的部落就是专门从事这一交换的行业，于是人们把这一行业就叫做“商业”，把用来交换的产品叫做“商品”。起先是以物换物，后来为了交换的方便，人们学会了用一种专门的商品来代替所有别的商品，这专门的商品就是货币。通常人们叫它“钱”，如铜钱、银钱、金钱是也。货币的出现大大促进了商业的发展。

人类为了生活的方便，自古以来还先后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服务业。如理发、茶馆、饭店、医师、钱庄、旅社之类，当然也有算命打卦，巫婆神汉之流混杂在服务业之中。

教育后代尤为礼仪之邦的中华民族所重视，从孔夫子到当代的教授，从私塾到大专院校，教育成为推进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当今社会，人们为了适应新的环境，学习成为终生的需要；专门提供教育、培训的机构和团体应运而生，教育也成为一种产业。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文化、娱乐、艺术、体育等等需求，也如红尘滚滚，排山倒海而来，于是文化产业、娱乐产业、艺术产业、体育产业、咨询服务业，IT产业……，大行其道，势不可当。

旧时的中国，虽有“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之说，但行业歧视相当严重：

读书地位最高，常言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制造业也不错，“荒年不饿手艺”；商业较差，所谓“无商不奸”；基层服务业最低贱，“理头抬轿，不是好料”。所以，中国人难以从农业分离出来，与人们习惯鄙视商业和基层服务业不无关系。

人类社会，各行各业，何谓“生产”？“生产”这个词最早被用于“使新的物品产生”。起初人们认为所谓产品就是“土地的果实”，所以他们片面地把农业看作是惟一创造财富的生产部门。随着工业化的出现，传统的经济学只是把工业和农林牧副渔叫做生产，而把商业、金融、保险、教育、文化、娱乐、旅游、艺术、体育、咨询和其他服务，统统排斥在生产之外。许多概念因此弄得“剪不断，理还乱”。

究竟什么是生产呢？生产就是创造效用，创造价值的人类活动。首先，人们为了获得物质的生活资料，不得不进行一系列的作业活动，这就是最初的生产活动；随着社会的复杂化和人类需求的复杂化，人类需要创造的效用也越来越多样化，物质的、精神的，凡是以某种劳动工具改变劳动对象，从而创造某种效用的系列活动，都可以称为生产。

产品不仅仅表现为一种实物，也可以表现为一种服务。如宾馆服务，保险服务，影视服务等等。这类生产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即它的产品就是生产本身，产品是一个过程，服务的过程就可以称作产品，或者说生产与产品完全是一回事。当然，并非一切服务活动都是生产，而只有以创造效用、创造价值为目的的活动才是生产。当这些创造是用于向消费者交换时，这种生产就是商品生产。

那么，怎样解释政府行为不属于商品生产呢？因为政府行为一般不应直接介入创造生活资料和其他效用，政府行为的目的是提供创造价值的公共环境；政府的服务对象不是“消费者”，而

是“公民”。政府行为是要保障公共利益，即保证公民的安定、公平、环境的优化，从而保证社会的稳定发展。政府行为的结果不是“产品”，不是用于消费，而是用于对公民的保障和激励。一些公益性的社团组织和国际组织的行为也与此类似，只不过他们的服务内容、对象和方式有所不同。

传统的经济学家认为商人的营销活动不是生产，比如他们觉得制造家具的工人生产了家具，而家具商人只不过出售已经生产出来的家具而已。这种区别有没有道理呢？生产就是为了满足消费者需要，就是创造效用，商人和工人都为消费者的效用付出了劳动，作出了贡献。没有商人和没有工人一样，消费者都无法实现效用。负责在地上搬运煤炭并送到消费者那里的商业，同负责在矿井里采煤运煤的生产一样，都是煤炭的生产者。打鱼的和卖鱼的，都可说是挪动鱼的位置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没有理由把商业和其他服务业排斥在生产之外，因为他们同样都在完成创造效用或价值的过程。

消费是指人们为了满足生活和生产的需要而对资源的使用和消耗，包括生活消费和生产消费。衣食住行是消费，吃喝玩乐是消费，求知求助也可以是消费。总之，凡是满足人的生理需求和心理需求的物质生活、文化生活，都可称作生活消费。根据生产需要而消耗原料、材料和人力资源则是生产消费。如果用数学语言来表达，消费也可以看作是负生产。但生产和消费是相对的，由于参照物的不同，它们有时可以互换位置。比如生活消费，往往实际就是人力资源的生产，因为人必须吃、穿、用、行、学，然后才能成为有用的“资源”。而生产消费就是生产产品或商品的过程。人们生产物质和非物质的产品，其实不过是资源的重新整合，使它们成为新的资源并具有新的或更大的效用。人们的消费，则是享受这些效用给他们带来的好处和满足。

第二节 寻找经济学的起点

科学，对于许多人来说，似乎都非常深奥和神秘，但细心的人都会发现，许多科学的建立，都是从人们日常生活中非常简单、甚至不以为然的假设为起点。比如数学，设某一个东西为“1”，再加一个同样的东西就是“2”，从数字“1”到数字“2”其实这里就包含了一个并非事实的假设：第一个东西和第二个东西完全一样，而这在现实中根本就不存在。我们说一个苹果 200 克，三个苹果就是 600 克，这里我们就已经假设这三个苹果一模一样，而实际上任何两个苹果不可能一模一样。尽管假设有悖于事实，但这并不妨碍数学的发展。再如几何学上的一“点”，就假设它只有位置而没有大小，没有大小的“点”，在现实世界中哪里能找得到，又如何量度？牛顿物理学的起点是力学三定律，加上万有引力定律，由这四个猜测构成了牛顿物理学的“内核”，牛顿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建起了他的科学殿堂。

经济学的建立也需要有假设，因为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是人类的生产和消费活动，所以有关经济学的假设离不开关于人的本性的猜测。又因为人类的生产和消费与人对于财富和自身利益的态度有关，所以经济学要涉及的人的本性，便有一个“自私”与“无私”之争。自私论者说人的本性源于动物的生存竞争，“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因此人生来就是自私的。无私论者说“自私”是一种“意识形态”，是随着私有制的产生而产生，随着私有制的消亡而消亡；只要消灭了私有制，“自私”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自然无藏身之地。其实，平静的争论也许无可厚非，但政治家往往利用这争论来开展“政治斗争”，政治斗争一旦介入学术争论，必然扼杀学术自由，进而有害于社会。其实“自私”也好，“无私”也好，都可以说是一种假设或者是一种猜想，

这类假设或猜想对与不对并不急于解答，关键在于以这假说为起点，你能否建立起自圆其说的科学“殿堂”，并游刃有余的解释现实生活中的诸多问题。就好比“哥得巴哈猜想”，虽然没有得到确切的证明，依然可以用实践来检验它。也如数学中的“两个苹果可不可能完全一样”，几何学上的“只有位置而没有大小的‘点’存不存在”等问题的争论，实际上毫无意义。

在中国人的字典上，“自私”是个贬义词，说人的本性是自私的，使许多人的自尊心感到蒙受了耻辱，感情上不能接受。也许是由于这个原因，上个世纪中叶，“无私论”者在中国大大占了上风，硬是不让“自私论”者有说话的余地。直到近二三十年来年之前，人们才发现遁着前者学说的路子，不仅许多经济学问题解释不清，而且国家的经济发展也远远落后人家几十年。因此“自私论”者才逐渐敢登大雅之堂。可见由争论而导致斗争不是好事，争论得势之后便要封住别人的嘴，那更不是好事。不管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一切重大科技的创新突破都需要相应的创新体制与科学管理机制作为保证。看来经济学要发展得定下一套规矩，第一少争论，第二勿斗争，第三让人家去自圆其说，第四谁说的能解释现实谁就是英雄。

二十多年前，我们在学校所学的经济学，名曰《政治经济学》，是以“无私论”为起点，以消灭私有制为宗旨而建立起来的。人们着实为马克思关于商品的论述所折服，从具体劳动到抽象劳动，必要劳动到剩余劳动；从使用价值到交换价值，价值到剩余价值，马克思挥动逻辑思维的教鞭，把个商品玩得团团转，叫人心悦诚服。那时的中国是个使用布票和粮票的时代，国内市场上的商品少得可怜，但价格稳定，从商品市场上几乎找不到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破绽。自己也曾有过依据对工人劳动时间的测算来定制商品价格的设想，并因此发表过一篇“论劳动形

态”的文章，但价格之事，几番思索，终于无功而返。

对于劳动决定商品价值之说，许多人的怀疑是从中国市场经济改革以后开始的。市场经济潮起潮涌，商品价格大起大落，人们发现从“劳动价值论”到“剩余价值学说”，在现实中除了鼓动劳动者起来“造反”之外实在无别的用处。付出同样劳动的商品，有时一文不值甚至是负值，有时却价高得令人吃惊。既然是负的无穷大到正的无穷大，那所谓围绕其波动的中轴线“社会必要劳动”又有什么意义呢？商品的价格几乎完全取决于市场的供求关系，这供求关系应该有它更科学的说明，而不应该仅仅只有琢磨不定、令人费解、由生产者单方面确定的所谓“社会必要劳动”这条无影无踪的中轴线。于是人们开始怀疑以劳动价值为基础的经济学。

以“无私论”为起点，建立起来的政治经济学尽管高耸而威严，但象海市蜃楼，并不能为解释现实所用，经济学家们自然又回到了“自私论”为起点的探索。但是“自私”一词在我们的习惯中总是列入贬义词，认为它是“恶”的表现，那是由于人们通常赋予了它极端的解释。鉴于“自私”这个词有碍人们的自尊，而且它的含义也并不十分明晰，于是经济学家们挑选了“追求自己的最大利益”的说法。

因此，我们要学习的经济学便找到了以下两个起点：

一、“个人”是所有经济分析的最基本单位。

二、在局限条件下，个人总是追求自己的最大利益。

关于人的本性的这种假设，在学术界被称为“经济人”假设，但经济人假设在学术界曾备受责难，这是因为早期的经济学理论对经济人的“自利”的动机和“理性”行为的解释过于狭隘。批评者认为：经济人模式只考虑个人主义的利益，排除任何利他主义的动机，是一种不完整的个人行为模式；这种模式排斥

社会习俗与道德传统对个人偏好的影响，因而忽视了人的社会关系。马克思就说过“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面对责难，经济学家拓宽了“自利”和“理性”的范围，把对他人福利的关心，纳入了个人的效用函数之中；把遵循习惯、传统规范和法律等制度，视为一种有助于效用函数最大化的理性行为。也就是说对他人的关心，也成为决定自利者效用函数的一个变量。因此，对于解释“人们有时会把社会利益置于私人利益之上”的事实，完全没有必要以所谓“社会人”、“伦理人”等观念来取代“经济人”。需要说明的是：权力、自我实现、尊敬、爱情、友谊、快乐、美感等等“非经济的”的效用，是个人效用函数的重要组成部分；诸如社会规范、道德准则等约束机制的存在，也是产生“受人尊重”、“自我实现”等等效用的方式和手段，因为必须遵守它们才符合个人自身的利益。严格地说，这里所谓“对他人福利的关心”是一种有条件的利他行为，这种利他行为依然源于个人的自利倾向。可见，这种自利有极其丰富的内涵和表现。

我们知道，非常复杂的化学分子可以在人类的身体中活动并使人类产生了智能，尽管这种进化非常缓慢；现代科学家还发现，生物的复杂性，可以用在 DNA（脱氧核糖核酸）中被编码的信息片段的数目来确定，但社会和经济的复杂性却没有找到或许根本不存在类似的“DNA”。社会和经济的复杂性取决于人的复杂性，人的复杂性来自生物世界的漫长演化。人类的“高尚情操”并不说明人已经脱离了生物而变成了天使。所以，我们说人的有条件的利他行为源于个人的自利，至少可以在人类的生物进化程序中得到证明。著名的奥地利哲学家波普尔认为，任何理论的内容都包含真性和假性两部分，而逼真度是真性内容减去假性内容的差。科学就是理性不断作出的假说，而这假说不断遭到批判，即被证伪。只有可证伪的陈述才是科学的陈述，而科学陈述

的可证伪度越高，即它被禁止得越多，它的经验含量就越多，也就是知识含量越多。能较好地经受住证伪的理论被认为是确认度高的理论。波普尔认为科学发现包含猜想和反驳两大环节。科学家根据现实中的问题，大胆进行猜想，努力按照可证伪度高的要求提出假说，这样的假说具有较多的真性内容。尝试性的理论假说提出后，就进入反驳，这时要根据经验，按确认度高的要求进行排除错误，从而保证所接受的理论假性内容减少或不增加。这样，通过猜想一反驳，科学发现便获得逼真度高的理论，即我们通常所说的“真理”。

第三节 经济分析的基本单位

经济学的第一个假设，或者说第一个公设，是把“个人”作为经济分析的最基本单位。所谓公设就是一种设定，大家都可以理解，用不着去证明，也用不着去争论。数学上“ $1+1=2$ ”，就是设定两个东西完全一样，非要去争论说世界上不可能有两个完全相同的东西，那就没什么意义；不做这样的设定，数学的殿堂就无法建立。当然这并不是说你不可以做新的设定，你重新设定后甚至还可以引出一个新的学科。如几何学上的第五公设，是说平行线无限延长永不相交，俄国数学家罗巴切夫斯基对它有怀疑，进行了重新设定，于是产生了一门新的空间几何学；德国数学家黎曼也对它进行了重新设定，创立了黎曼几何。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欧氏几何是适用的；在宇宙空间中或原子核世界，罗氏几何更符合客观实际；在地球表面研究航海、航空等实际问题中，黎曼几何更准确。可见一门学科的基础设定是何等的重要。

为什么把“个人”作为经济分析的最基本单位，因为社会生活中有选择或决策能力的最小单位就是个人我们每日都在不停的选择：现在是早上8点，我要赶快去上班，这是选择；天可能

要下雨，出门要带伞，这也是选择。每个人每天甚至每时每刻都在选择，只不过有些是潜意识的选择。你行为的结果也就是你选择导致的结果。

而且“个人”这个概念非常明晰，不论性别，不论年龄，不论高矮，也不论聪明与愚笨，个人就是个人，不易引起混乱，任何有观察力的人都可以鉴别。

有人不同意这个假设，他们的理由是不少人的选择并不是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而是受别人控制。比如员工是受领导控制，孩子是受大人控制，学生是受老师控制，战士是受长官控制，病人是受医师控制，个人要受团体控制等等，这当然有道理，但这并没有否定个人的选择权。假如你是战士，当班长命令向右转，你还是可以向左转，因为大脑和脚都是你的，你的脚必竟是受你自己的大脑指挥。你说那不行，我不听口令乱转，那还不要挨批？但你正是在挨批与不挨批这二者之中做了选择，所以你没有乱转。

总之，无论何种情况下，我们都得把个人对自己行为的选择作为经济分析的起点。任何经济问题都要以个人为基本分析单位，因为一个家庭、一个企业、一个团体、一个社会或一个国家都是许多个人的集合，尽管我们常常分析一个社会、一个国家的经济问题：什么宏观经济，什么社会福利，什么政府策划，但都一定要以个人分析为基础。

经济学不可以以集体为起点。无论怎样的“宏观”，若非基于“个人”为起点的，都不可能是有效的经济理论。也就是说，如果是有效的经济理论，必然符合以个人为起点这一原则。我们分析宏观经济，脑子里必须要以个人为起点。当然，以家庭、集体或整个社会为着眼点的经济理论有的是，但这些理论如果不是建立在以个人分析为起点的基础之上，则一定是无效之作。也许

在某些条件下，宏观决策比微观决策更显得重要，但这宏观依然是以个人为单位的微观的组合，也依然不能脱离经济问题都要以个人为基本分析单位的原则。社会犹如生物肌体：如果个人是社会的细胞，而家庭、企业、社会团体则是不同的肌体组织。但你分析这些肌体组织时，不可否认它们是由细胞组成，也不可否认它的功能取决于这些细胞的有机组合。

还有一点需要说明，那就是既然“个人”作为经济分析的最基本单位，就必须贯彻始终，贯彻到每一个细节。也就是说一个基础的假设，不能朝令夕改、变化无常。不可以将一些问题以个人为起点，而另一些问题却以集体或以其他为起点；而且也不能有例外，不能某个经济理论有特殊情况，而不在此例。当然，好些问题在一般常识上是取决于集体或其他环境因素而非个人，但在经济分析上，还是要以个人为起点。

经济学家确定“个人”的地位如此重要，是因为所有经济学意义上的基本选择都是由个人作出的。集体的选择，是个人选择的集合。英雄也好，普通人也好；领袖也好，白痴也好，都是如此。即使一个人在极权的政治体制下失去了自由，这个人还是作了不自由的个人选择。即使一个人是极权制度的最高首脑，他的选择也是要受到某些约束，尤其包括人的本性的约束。因为自由和不自由，约束和无约束，都是相对的。天下没有绝对的不自由，也没有绝对的自由；任何选择都一定有局限的约束，但这并不否定个人选择。

也许有人会举出极端的例子说：难道白痴的选择也与正常人的选择同等对待吗？我们认为，尽管白痴的选择是一种病态的选择，但一般情况下，周围的环境也会引导或迫使他按正常人的规则行事，否则他的生存就有问题。就如一个盲人走人机动车道，一般会有人引导他回到人行道一样。

生物学家告诉我们，细胞核中 DNA（脱氧核糖核酸）包涵着人体的全部信息。个人是社会的细胞，人的大脑中的思维和人本身的一切，包括衣着和行为，都反映着一定的社会关系，“人”确实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经济学虽然难以发现和解读其中类似 DNA 的信息编码，但强调“个人”是所有经济分析的最基本单位，就是要通过对一定条件下个人行为的考察，来分析社会经济发展的轨迹。

第四节 局限条件和最大利益

任何时候，任何地点，任何人，都不可能有绝对的自由。也就是说人的选择总是要受到条件的约束，总是有一定的局限。下雨了，出门要带雨伞。“下雨了”是局限条件，“带雨伞”是选择。但同时刮大风呢，雨伞撑不起来，看来得穿雨衣或想别的办法。在许多情况下“局限条件”非常复杂，调查也非常困难，但是“局限条件”不可以是想象的，它必须是来源于真实世界。

“下雨了——带雨伞”，这是非常简单的决策。类似的决策还有：渴了要喝水，饿了要吃饭，困了要睡觉，这东西贵少买一点，那东西便宜多买一点……等等。为什么会作出这样的决策呢？这个问题听来也许好笑，但经济学要探究的往往就是人们决策背后的深层原因，往往就是这些看似幼稚的问题。可以把人引入一个新的天地。据说牛顿发现万有引力，就是坐在苹果树下问着一个同样“幼稚”的问题：苹果为什么会往下掉，而不是往上飞？

针对人的日常决策或选择的问题，经济学进行了第二个假设：在局限条件下，个人总是追求自己的最大利益。当然也可以说成，在局限条件下，个人总是追求自己的最小耗费。这是一问题的两个说法，是同义反复。好比一辆太阳能汽车，总是希望

得到更多的太阳能而消耗更少的太阳能。许多学者认为，人必须自利才有社会整体的最大福利。社会是由个人构成的，如果人人放弃了自利，社会中谁还能得利呢？人们常说：不爱父母的人，怎能指望他去爱别人？进而推论：不爱自己的人，怎能指望他去爱别人？人类社会物质享受的增长，不正是每个人追求自利的力量所推动和促成的吗？利己与利他在宏观上其实是一个完美的统一。

人是复杂的，“经济人”作为一个基础假设，仅仅是为了找到一个平台，因为没有有一个坚实的平台，就根本无法建立起经济学的殿堂。正因为人的复杂性，对于人的本质中究竟是自私还是无私占主导地位，人的本性究竟是善还是恶，心理学、哲学或道德伦理学等学科当然还需要进一步研究，也完全可以有不同的结论，经济学家假设人是怎样的，目的是从这里出发来解释社会现象，并不是宣告这类问题研究的终结。

然而，责难总是不可避免：人的行为难道真的是一两个假设就能笼而统之？无耻的欺骗与无私的奉献、可恶的小偷与可敬的英雄，难道都是出自这同一假设？

尽管有这样诸多的质疑，假设仍然是不可或缺。我们不妨想一想达尔文的《进化论》中关于“人是从类人猿进化而来”的结论：无耻的人与光荣的人，可恶的人与可敬的人，都出自同一个祖先。由此可以想象，关于人的同一本质的假设并非离经叛道。科学研究，确实需要多一点包容，多一点宽厚。

人生在世，境遇各异。有的富裕，有的贫穷；有的高贵，有的低贱。也正因为有了各自不同的“局限条件”和“个人选择”，才造就了形形色色、多种多样的“人”，小偷、骗子也好，英雄、伟人也好，都可以在“追求自己最大利益”的驱使下各得其所。

小偷、骗子自然不必说，他们追求自己的最大利益，是可恶